

热历史

“中国梆子”的戏曲文化坐标

□刘桢 焦振文

高亢激越、热耳酸心的梆子腔是我国传统戏曲四大声腔中流传甚广、留存剧目繁多的一个庞大家族。它发祥于晋陕豫“金三角”地带，流布于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16个省份，涵盖秦腔、蒲州梆子、山西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豫剧、河北梆子、老调梆子、山东梆子、莱芜梆子、枣梆子、章丘梆子等29个剧种。可以说梆子戏从西北一隅进入京师，便以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势盛行全国，甚至连被奉为官腔的昆曲亦受其挑战，遭到冲击，致使京师观众“所好唯秦声……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清张坚：《梦中缘传奇》），纵使皇家竭力挽救，昆曲终难维系其霸主之位。取代昆曲的花部梆子戏自西而东，由北向南，所过之处，吸纳当地方言与民间歌舞小调，继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梆子戏剧种，成为京剧诞生之前流布区域最广、影响最大的新声腔，形成了与昆曲分庭抗礼的“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戏曲格局。

梆子戏形成与流布脉络

板腔体梆子戏形成于明末清初，其形成初期曾有“土戏”“乱弹”“桃桃”“梆子腔”“秦腔”等不同的称呼。梆子戏成熟之后，人们又根据地域将蒲州境内流行的梆子戏称为“蒲州梆子”，同州境内流行的梆子戏称为“同州梆子”（东路秦腔），而把在豫西北一带流行的梆子戏称为“河南讴”“靠山吼”“土梆戏”，也就是后来的河南梆子，今天的豫剧，也有学者将这些梆子戏统称为山陕梆子。应该说山陕梆子成为今天中国梆子戏当之无愧的鼻祖。

山陕梆子形成后，开始了北上南下、东进西溢，并且迅速与当地方言、民俗、审美等因素相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梆子戏。蒲州梆子向北流布，在晋中、晋北一带，吸收当地方言与音乐，形成了中路梆子（晋剧）和北路梆子。蒲州梆子又和秦腔向北经张家口进入北京、直隶一带，与当地方言、民间音乐等相结合，同时受到北京戏曲尤其是昆曲的影响，于道光年间形成了有别于山陕梆子的新剧种——河北梆子。清同治、光绪年间，河北梆子演化为大同小异的3个艺术流派即山陕派梆子、直隶老派梆子和直隶新派梆子，时至今日，人们习惯上称流布于河北一带的为河北梆子、流布于天津一带的为卫梆子，而将流布于北京市里的则呼之为京梆子。河北梆子继而又向北流布到了东三省一带。山陕梆子继续向东，流布到山东形成了山东梆子、莱芜梆子以及章丘梆子。秦腔则在陕西发展为东、西、中、南四路：东路秦腔，也就是同州梆子；西路秦腔，又称西府秦腔；中路秦腔，又称西安乱弹、西安梆子；南路秦腔，又称“汉调桄桄”。此外，河南梆子（豫剧）也开始了西拓与东进，首先在河南分化出平调，在豫、鲁交界处形成了怀梆，在南阳一带，与流传到当地的山陕梆子相互影响，又形成了宛梆。山陕梆子继续迅速向江南各地流布，康熙年间的湘西已有梆子戏演出的记载，“现在汉剧西皮，湘剧、祁剧、桂剧的北路，粤剧的西皮（历史上曾有北路梆子腔之称），川剧的弹腔，滇剧的丝弦腔，



▲万荣县庙前村后土祠戏台模型



▲明代《西厢记》戏曲俑

本文图片 记者 刘亚 摄

贵州梆子等都是早期梆子戏流传到西南后的产物”（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考论》）。除去山陕梆子影响下产生的较大的梆子腔剧种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并未直接受到山陕梆子影响，而是由当地古老的民间小曲、说唱艺术孕育而成的梆子戏，主要有：流行于保定、沧州及雄安新区一带的老调梆子，发轫于河北武安一带的武安平调——上党落子——内黄落腔一脉，发轫于山西上党地区的上党梆子——西调一脉。时至今日，中国梆子家族已成枝叶扶疏之势。

梆子戏的崛起及历史沉浮

梆子戏自形成之后，其兴衰沉浮几乎与中国整个传统戏曲的发展变迁轨迹同频共振。从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花部地方戏崛起，成为戏曲发展新的有生力量，梆子腔剧种发展进入兴盛时期。乾隆朝正值中国戏曲史上的“花雅之争”。几番较量，至乾隆后期，秦腔泰斗魏长生凭借《滚楼》一戏名动京师，竟使“京腔旧本，置之高阁”，“六大班伶人失业，争附入秦班觅食，以免冻饿而已”（清吴长元《燕兰小谱》）。最终，花部梆子戏取代了雅部昆腔的霸主之位。到了清末民初，几乎所有梆子戏剧种均已成熟，像秦腔、晋剧、河北梆子等大的梆子剧种业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清乾嘉时期，秦腔在西安和北京形成了两大演出中心，以致出现了“今则乱弹盛行……半夜空堡而出，举国若狂”的盛况。（清严长明：《秦云擷英小谱》）清咸丰、同治时期，由山陕梆子流布到今天京津冀一带的河北梆子也已呈现出繁盛景象。1870年代至1920年代左右

河北梆子达到鼎盛时期，其锋芒锐气堪与京剧争胜。此时，班社林立、名伶辈出，剧目丰富，流播广远。旦角名伶田际云（艺名“响九霄”）创立玉成班，首开京剧、河北梆子同科学艺、同台演出之先河，戏曲界将京剧与河北梆子两个不同剧种同台演出的形式称之为“京、梆两下锅”，不仅如此，田际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首次招收女弟子，坤伶的出现不仅极大拓展了梆子戏的题材表现范围，促进了旦行艺术的长足发展，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受众群体。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连年战乱致使梆子戏连同其他戏曲剧种一样遭受到致命打击，就连影响较大的秦腔、河北梆子、豫剧等大剧种都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梆子戏命运的转变是从解放区开始的，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梆子戏才真正得以枯木逢春，迎来了第二次辉煌。20世纪50年代初，党中央确定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启的以“改人、改戏、改制”为核心的戏曲改革，使得梆子戏得到了新的发展，并且较之以前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们今天看到的诸如《秦香莲》《春秋配》《蝴蝶杯》《宝莲灯》《打金枝》《下河东》《三滴血》《朝阳沟》《龙江颂》等各个梆子戏里的经典剧目几乎都经过“戏改”阶段的打磨，昔日为人轻贱的“戏子”翻身成为人民艺术家。

1980年代初期，梆子戏连同中国传统戏曲一道迎来了第三次高潮。老调梆子艺术家白玉昌激动地说：“1981年后，老调团在农村演出，那时传统戏下乡也很受欢迎。尤其是在农村的庙会，几乎全年满台口，几个村抢着定戏，甚至还出现过为抢夺戏班子而发生争执的事件……在城市也同样如此，《潘杨讼》恢复上演，人们都连夜排队买票，还有托关系买票的……”。

20世纪80年代末乃至21世纪之初，包括梆子戏在内的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日趋衰落。

梆子戏的再度好转，始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启动。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学者、职能部门乃至大众逐渐对传统戏曲、对梆子艺术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认知不断深入，各地的保护力度愈益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对包括戏曲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达到空前程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及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一批利好政策，加大了对传统戏曲艺术的保护、扶植力度。当下，送戏下乡、戏曲进校园、名家传戏、戏曲名家工作室、戏曲展演、戏迷票友大赛等高密度出现，这些对于梆子戏的发展无疑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中华读书报》）

附庸风雅的“苦海”

□杨建民

何为“苦海”？冯梦龙这样说：有一郑光业及兄弟，遇见有人撰文献词，他们便把其中句子不通、词语不顺的文字挑出来，投放到一个大皮箱中。大皮箱起了个名字“苦海”。冯梦龙最后说：大皮箱中，写文章者几乎人人有份，故此“莫要轻易便张口笑人也”。

相传在李白辞世的采石江头，有一座李白墓。来往之人，总要写诗感叹一番。有一人见到如此多的题诗，大为不满，也写成一诗讥刺：

采石江边一抔土，李白诗名高千古。来的去的写两行，鲁班门前弄大斧。

他认为，在李白墓前题的诗，该进“苦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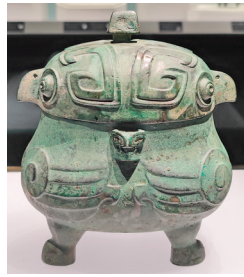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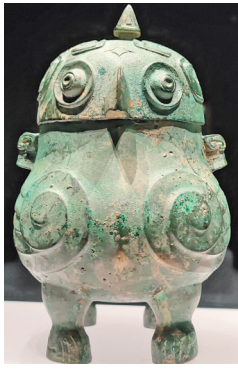
宋哲宗时，有一个宗室子弟也愿意附庸风雅，常常写诗。有一天，写出这么一首即事诗来：“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泼听琵琶风，慢抛接建章。归来屋里坐，打杀又何妨。”

没有人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他便自己出来解说一番：我最先看到三个蜘蛛在屋檐前织网，又看到两只麻雀在厢房廊中相斗。再看见一只死青蛙，翻着肚皮，好像一个“出”字，还有一只死蚯蚓像个“之”字。刚吃罢饭，听见隔壁有人在吟唱《凤栖梧》（词牌名），我馒头还莫吃完，听看门人说建安的一位姓章的秀才来见，见过姓章的之后，看到内门上有一幅钟馗打小鬼的画。所以又有“打杀又何妨”的句子。真正笑煞人。只管自己见啥写啥，不顾读者知不知晓。此诗可以全数搁进“苦海”。

（《今晚报》）

史海钩沉

商代鸮卣酷似“愤怒的小鸟”

◀商代鸮卣
记者 刘亚 摄

□金叶

鸮是猫头鹰，卣是一种酒器，而“鸮卣”合起来理解就是“猫头鹰造型的酒器”。山西博物院珍藏的这件商代鸮卣，1957年出土于石楼县二郎坡村，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精美之作。造型为两只猫头鹰背靠背站立，以盖为首，以器为身，器盖与器身子母扣接，有四足，盖上一捉手。整件器物圆润敦实，雄浑大气，凛然威武又不失可爱。因其造型酷似网络游戏“愤怒的小鸟”而被众多网友所喜爱，被评为最萌的文物。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猫头鹰是一种不吉祥的鸟类。然而再往前追溯，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对鸮还是很喜爱的。这可以从虽占总数不多但比较集中于商周时期的鸮造型青铜器上反映出来。《周礼·鬯人》中有“庙用修”的记载，“修同卣，卣，中尊，谓献象之属”。可见，卣是一件集实用与礼制于一身的器物。商代青铜卣有很多做成鸮形，而已见的鸮卣又多做成这种两鸮背立的形状。

猫头鹰是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的主要图腾崇拜。猫头鹰在红山文化出土的各种动物器型中数量最多。当时的人们经常在黑暗中遭受野兽的攻击，而猫头鹰在黑暗中可以像雄鹰一样轻易捕捉到食物，自然而然就获得了人类的崇拜。显然，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希望猫头鹰能够给予自身与自然界抗争的神奇力量。而这种图腾文化的影响一直到商周时期依然浓烈。红山文化的先民属于古华北人，即世居黄河以北、长城以南的部族，还包括现在的陕西、山西北部 and 内蒙南部地区。鸮卣的出土地石楼县二郎坡村，正好处在红山文化所影响的地域带。（《广州日报》）